

台灣歷史記憶與文學研究重建的問題

■陳芳明／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社會文化委員會委員

跨世紀的台灣文化，將會因台灣民族主義的成熟而有全新的思維。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文化，絕對不會發展出傷害性、排它性的民族主義。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必須在開放、多元的基礎上去解決。

跨世紀的新政府形成之際，台灣歷史記憶與文學研究的重建問題，需要更為深沉的思考。從1987年戒嚴體制的終結，到2000年陳水扁政府的建立，這十餘年間有一個重要的人文發展趨勢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隨著本土意識的日益高漲，有關台灣歷史與文學的研究漸漸獲得釋放的空間。這是相當典型的後殖民文化現象。

在終戰之前，一般史家都將之劃歸為殖民時期。因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部份淪為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戰爭結束，這些殖民地紛紛宣告獨立，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治主權與文化主體。然而台灣社會的後殖民時期，並不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結。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以後立即實施的戒嚴體制，無論就權力結構或文化支配而言，都與殖民體制無分軒輊。因此，當世界歷史在戰後開始進入後殖民的階段之際，台灣後殖民時期的到來，較諸世界史發展的速度還要遲到四十年。必須等到1987年戒嚴解除之後，台灣社會才獲得檢討殖民經驗的從容空間。

在高度的權力支配之下，台灣知識份子

通過長期的民主運動而蓄積旺盛的批判力量。這股批判力量是結合強烈的台灣／本土意識而展開的。幾乎可以說，民主運動的崛起，以至蓬勃發展，全然是以台灣意識為基礎。為了達到去殖民的目標，民主運動似乎是放在本土精神與外來政權之間對抗的脈絡上而進行的。從民主進步黨的建黨成功，就可得到印證。它一方面是中產階級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的產物，一方面也是長期潛藏於社會內部的悲情歷史意識之產物。也就是說，中產階級的主觀願望與歷史情境的客觀條件，促使民主運動成為戰後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

陳水扁政府的誕生，使台灣意識的發展臻於高峰。無論稱這樣的意識為命運共同體，或是台灣民族主義，現階段的人文工作者顯然面對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究竟是要繼續保持台灣意識的受難心態，還是要使之成為一種昇華的、包容的民族主義？這個問題牽涉到日後台灣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的基本立場，而更重要的，也牽涉到整個台灣文化主體重建的基本態度。這篇報告的提出，在於迎接人文思考的新

時期到來之際，以台灣文學研究者與散學者的身份表達個人的一些關切。

新政府時代的到來，文化主體重建的目標似乎已經在望。不過，這樣的期待不能過於樂觀。新政府的女性閣員較諸舊政權，在數量上有了顯著的增加；但這並不意味台灣的人文思考也有了質的改變。

這裡必須提醒的是，與三〇年代與七〇年代的知識份子思考對照之下，現階段的知識份子相當欠缺階級議題與性別議題的思考。

資本主義在八〇年代的飛躍性發展，使台灣社會的右翼思考越來越鞏固。誠然，沒有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就不可能孕育堅強的中產階級；沒有中產階級的改革要求，就不可能催生民主運動；沒有民主運動的持續追求，就不可能完成反對黨的建立；如果沒有反對黨的突破政治格局，就不可能迫使戒嚴體制宣告終結。這種連鎖性的歷史進程，都與資本主義的右翼思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樣的，反對運動中的中產階級幾乎都是由男性組成，父權文化經過政治運動的鍛鍊，也更形結實頑固。右翼思考與男性思考，注入文化主體再建構的運動中，便潛藏了相當嚴重的人文危機。

右翼／男性的民主運動宣告勝利時，左翼的思考恐怕會更將淡化而衰弱。從前在反共時代，左翼運動是在強制性的威權宰制下被迫消逝的。如今，左翼的人文思考則是自然消亡的。欠缺「左」的思考，將會使社會內部的批判力量削弱。所謂左翼思考當不止於階級議題的提出而已，它關心不會只是停留在農民、工人的身份之上，而是擴及資本主義體制下所有的弱勢族群。因此，左翼思考應該是包括了農工

階級之外的沒有發言權的島上住民，亦即原住民、老人、外省老兵、女性、殘障、同志，都容納在「左」的關切對象中。甚至環保議題，也應包括在左的批判精神之內。這些人沒有發言權的根源，乃在於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勝出，與資本主義之優勢強化有了堅固的結合。

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已經遠離戒嚴的反共體制，但是左翼的史學研究與文學研究並未有復甦的跡象。如此傾斜的學術風氣，並不能有助文化主體的重建。

文化的再建構，必須在主體性（subjectivity）與整體性（totality）兩方面相互兼顧。整體性的照顧，便是涵蓋族群、性別、階級等之層面的議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左的思考不但欠缺，性別議題也有待加強。

自八〇年代以降，女性意識文學的大量的崛起，正好可以說明台灣社會的性別議題已開始在文化主體重建的運動中提上了日程表。女性文學的批判對象是父權文化，亦即所謂男性中心論。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其他不同議題的文學，也在大量生產之中。同志文學的蓬勃現象，乃在於挑戰異性戀中心論。眷村文學的抬頭，則在於挑戰福佬文化中心論。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更在於批判漢人文化中心論。這種種文學思考的活動，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便是挑戰權力的壟斷與支配。

對於這種去中心的解構思潮，有人將之命名為後現代文化現象。不過，台灣社會經過長期殖民／再殖民的統治，追求的當不止於權力的解構（deconstruction），而且也在追求主體的再建構（reconstruction）。因此，八〇年代的文學批判運動，應該是屬於後殖民的文化現

象。然而，無論是後現代或是後殖民，台灣社會之朝向開放與再開放，已是任何政治力量無法遏止的。

現階段這些議題的追求，應該是隨著新政府的形成而繼續發展下去。不過，在目前較為迫切的問題，乃在於研究環境必須要加速改善。十餘年來，台灣研究一直被冠以「顯學」的標籤。從這個標籤來看，彷彿台灣研究的地位已經穩固，在資源上也已經非常充沛。這種看法，與現實有很大的落差。事實上，台灣研究仍然停留在「險學」的階段。僅從學院的課程設計而言，當可理解目前台灣研究的處境。

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的開設，在每個大專院校的中國文學系裡都已普遍化了。這種普遍現象，是「顯學」一詞的主要根源。從實際的研究經驗來看，這樣的課程設計是非常的偏頗。中國古典文學的課程，劃分得相當細膩，從詩經、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等主題，各有專業的課程設計；其他像志怪、傳奇、戲曲、話本、小說等等，也是特定的研究領域。中國文學源遠流長，需要大量的課程才能完整容納，這是能夠理解的。但是，凡是涉及台灣文學的研究，卻只以一門「台灣文學」予以處理。原住民文學、古典漢詩文

學、日據新文學、戰後現代文學，無論從族群或語言的內容來看，性質相互歧異。這些課程有必要以各自專業的領域去設計，而不是以含混的「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一詞概括。

台灣文學能夠進入大學殿堂，乃是台灣意識高漲以後的結果；然而，現階段台灣文學課程設計的方式，則是中國意識支配的殘餘。目前中文系的最大危機在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教授要找指導的學生，越來越困難；而台灣文學研究的學生，要找指導的教授，也越來越困難。這是中文系所面臨的雙重危機，也是解嚴後台灣文化主體重建過程中所遭遇的一個困境。台灣文學的課程需要重新設計，不僅要照顧到歷史階段的不同性格，也要照顧到文學內容的不同議題。

跨世紀的台灣文化，將會因台灣民族主義的成熟而有全新的思維。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文化，絕對不會發展出傷害性、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必須在開放、多元的基礎上去解決。專斷式、壟斷式的權力支配，應該轉化為民主式、開放式的權力分配。從這樣的立場的出發，曾經受害的台灣歷史，才有可能昇華為受惠的文化遺產。◎